論胡適與張君勱

夏康農著

小序

中國大地之上正經歷着我們自己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的內戰，報紙上驚心動魄的標題卻重複不斷地刊載着「美援」的大字。這對比在後世的子孫不知將發生什麼感慨，對於當前在這一片土地上呼吸蠕動着的同族人們，該是多麼沉重的一份負担！是神還是鬼，是天堂還是地獄，對於這個民族和他的土地，都得由這一場戰爭裏判分。

就在這大戰初露迹象的時候，上海的言論界曾經顯露過一陣急迫搶救的熱忱。我也孱和在這一陣裏寫了些須文字。生活既然決定我只能作點這樣的事情，也就這麼作了，聊破當時一己的枯寂。其中有的接觸到我留心過的人物，時代替他們畫下了一份不高明的行狀，他們偏就是我們文化界的「清流」。由於着鎮時凜於民族大禍的難求倖免，我寫來也就犯了「世故」的大忌，不能「對事不對人」，而卻從人身上看事。「察淵魚者不祥」，也就顧不了許多了。

其實像這樣的人物和這樣的事，能說出比我說得更妥貼的，何只千百人？我無非整理了

一下和偶爾來訪的青年們的談話，移到紙上而已。從青年們感覺到這種文字也還有點用處，我這纔警覺到自己已經幷不年輕。

這裏集納起來的這兩篇，就是在這種生活情況之下寫出來的。今天事隔一年多，胡適之張君勱兩位博士的作風，仍然依照他們的邏輯推演。尤其胡博士，宣佈了他「過河卒子」的誓辭以後，捨不得收斂他的毒性，只恨中國不能一下子全盤奉獻給他心頭「景仰」的宗主國家。他能夠以美國豪門之心爲心，有意抹殺自己民族的災難，睜起眼睛看住美國豪門的仇家。年來對自己的事情，他說過「和比戰還要難，」意思是要借侵略者的刀鋒殺盡一切忠於民族的同類。對外的問題，他發表過給周鯁生校長的一封通信，說他從此不能再認蘇聯作朋友，意思是蘇聯的存在妨礙了美國的擴張。甘心事大，爲虎作倀，知識份子幷不正面問政而喪失了民族氣節到了胡博士這樣的田地，此人眞算够突出的人物了！

這幷不是「歷史的偶然」，這是中國歷史新頁的必有醜象。這是美國型侵略作風着重文化侵略政策的必然發展。尤其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自己受了一場南北戰爭的頓挫，再來中國時，中國已經被國際衆多侵略勢力劃分範圍到不留隙地的情形之下，它的對華侵略，只能採用狼蒙羊皮的文化方式。庚子賠款的「退還」，它首先示「惠」，專用於對華文化事業；這案子在美國國會通過，到今天剛好四十年了。這新型的巨大「歐洛克」該到了大量收取

「肉祭」的時候了。胡博士「義」不容辭，半生來總沒有忘記「還債」的說教，今天更挺身以第一號「肉祭」自許，貢獻他的全部心力了。

這就毋怪乎胡博士以一名白面書生的身份，偏能贏來前幾天幾乎受到禪讓「大寶」的消息，也毋怪乎這個消息剛一發佈，太平洋彼岸的報紙（例如紐約先鋒論壇），立刻就給回一陣歡呼的彩聲。

我在前年冬季全國抗暴聲中寫下的文字，只能約略估計到像這樣的發展。「今朝都到眼前來」，文化！文化！竟成爲這可咀咒的名辭！當時我還不曾揭舉胡博士的恩師「杜威博士」原本就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政策的僕役之一人，他之一度來華「講學」，根本就負有不輕的使命。此人回國後的寫作，正如胡博士所說，時常「關切」到中國的事情。要用「杜威博士」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樣的形式：

「我們對中國的關切不是經濟的，而是父母對兒女的那種關切。……父母也希望將來得到兒女的幫助，但是期望經濟的利益并不是父母感情中的精髓。」（見所著「美國與遠東」一文，一九二六。）

如果今天有人以爲稱呼某某有了「美國爸爸」就算是一種侮辱，對照着這位「大思想家」的言論來看，那可是犯了絕大的錯誤，美國有不少人早就以「爸爸」的身份對待中國人

了，——至少對於像胡適博士代表的類型人物還是千眞萬妥的。

所以，今天還值得大家多多認識這樣的類型，尤其值得進一步研究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歷史全貌，我這舊稿的重印，也出於側面補充這種研究的一點微意。

至於張君勱博士，他久矣放棄了他的文化生涯，而是一名「民主」的黨魁。雖然他最近從新大陸「講學」歸來；但是既然連新聞記者都感覺不出報導的興趣，我們也就從簡不談了。

胡張兩位博士在思想上以及對於「文化」的看法上，本來是居於背道而馳的兩極，今天在政治行動上他們可是沆瀣一氣，融和無間。這件事本身，就是那思想文化的性質的最好說明。兩博士一位已經是「製憲」專家，一位可能是將來「行憲」的大吏，此地兩「賢」合傳，應當是一件「美」談。

以上就是集結這册小書的理由，爲了情趣的改變，我改易了兩文舊稿的冗長標題。

夏　康　農

卅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目次

論胡適

一　前言

我以下列兩點理由着手寫這篇文字：——

一、胡適博士（這是美國文獻裏習慣尊稱胡先生爲『Dr. Hu Shih』的中文翻譯，是爲了尊重胡先生盛名的來源而採用，別無他意。）和他所能支配，影響的中國一部份社會力量，對於中國的進步曾經有所供獻，其中至今也還包含有可尊敬的學術中人。但是胡博士本人却過於看重了自身——就是胡博士論「不朽」中的「小我」——的利害，以至於不惜蒙混是非，顚倒黑白，損傷了學人的尊嚴，妨礙到大家所託命的公同社會——就是論「不朽」中的「大我」——的進步與發展。這情形已經有不少年了；胡博士爲了這個也已經背負了不少年的責難與輕蔑。隨着災難中的中國生命的推演，到今天更際遇着胡博士的這個不良慣性可以發揮更妨害「大我」生活的影響，所以值得論列。

二、這第二點也可以說是第一點理由的引伸或註解。

胡博士雖然不治自然科學，但他很尊重自然科學的。首先，他的「哲學」（假如算他有哲學的話）據他說是最得力於赫胥黎和杜威（「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三一，商務版），而赫胥黎是生物學家，至於杜威呢，「杜威受了近世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最大，所以他的哲學完全帶着生物進化學說的意義。」（「胡適文存」第一集頁四四七，亞東版）可見得這「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又於胡博士主持教育行政的作風中，他可以對於新聘的同等資歷同等造詣的教授作分別等級的待遇，理學院的每每高於文學院的一級或兩級，更見出他推重自然科學的苦心，雖然不免有點委屈了他自己的本行。再如他對於世界自然科學家中曾經特別推重過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爲此作過幾次演講。

所以，他一生諄諄教誨後生要「科學態度」，尤其立論要有「科學根據」，這就引入了我的第二點理由的正題。就在巴斯德創立的微生學領域內，近年來發現了新的事實，叫作「細菌移殖的漸進的毒性」。若干細菌學家實驗的結果，發現細菌的毒性可以變異，本來對於某種實驗動物無毒的細菌，經過輾轉移殖以後，可以變爲有毒，而且愈經移殖毒性愈增强。例如，最普通的鏈球菌（Streptococcus hypervirulenus）對於一隻兔子的毒性並不太强，需要注射一立方厘米分量的菌苗，才能生效。可是經過次第移殖的手續，毒性可以增進

到只須一百萬分之一立方厘米的菌液注射就能殺死一隻約三公斤重的健康的兔子，（這是Marmorek教授的研究報告）

假使我們都和胡博士一樣地尊重科學，那麼，照我在第一點理由裏所說，胡博士之於中國，從前不只無害而且也作過點有益的事情，正如本來無毒的細菌一樣。（請讀者不要覺得這比擬刺眼，而要打起精神來看，這是爲了「科學的尊嚴」！）可是隨着中國現代歷史的推動，也就彷彿細菌的移殖一樣，胡博士可就逐漸變得對於中國有害，而且愈變其有害性愈强。例如，曾激起全國憤怒的美國兵對北大一女生橫施强暴的事件，胡博士就可以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且隱瞞着自己的政治偏向，希望學生不作政治聯想。甚至對於法律問題，他又不說明究竟應當算是中國的法律問題，抑或應當算是美國的法律問題？難道中國法律上竟載着有關於美國駐軍强姦中國女子的條文麽？還是美國法律上載着有關於美國征服「友邦」的遠征軍人强姦那「友邦」的女子的條文呢？這種自患隱病，就至於含糊躲閃，曲袒外來强暴的說法，胡博士在從前是還決不肯出口的。豈只不肯出口，而且一定會和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一樣，憤不可遏的。這證據就見於載在「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冊裏面的「李超傳」。李超是當年北京女子高師的學生，爲了逃避婚姻，經歷了一串困難，至於以病以死。這在今天該是好稀淡平常的事情，當年可引起胡博士的大篇文章。他說：「她本

來體質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願，故容易致病……後來病更重，……遂死在法國醫院」（「文存」一集頁一〇七八）「李超傳」的煞尾還有這樣的話：「我替這一個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裏一篇長傳。……可以用做無數中國的女子的寫照，……可以算作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文存」一集頁一〇九二）胡博士在當年「李超女士追悼會」裏的沉痛致辭，我現在耳畔都還能彷彿一二呢。

從當年的李超小姐到今天的沈崇小姐受到的胡博士的不同的看待上，不只可以看出兩個時代的青年對胡博士自然會有如何不同的反應，而且也是胡博士「移植的毒性」的最好的說明。昔日的胡博士勉勵青年奮發向上，今天他却只許青年萎頓畏葸。這不只是一般常情的年齡的影響，還與他本來的氣質有關，是屬於可能有毒的那一類，經了時代的移植，毒性就愈趨愈强了。

爲了這一點「科學」的理由，我按捺着感情竟浪費了這一大堆筆墨，抄錄些在今天了無意義的文字，原因就正是彷胡博士的所謂「科學態度」，「拿證據來」，好讓今天還迷信胡博士的人們看看。實際上，人類社會現象比細菌社會現象自有更複雜的規律，照嚴正的科學態度說來，這種「人本主義」（Anthropocentrism註）式的附會科學，是並不足爲訓的。

然而胡博士談思想就可以這麼囫圇其辭。例如他可以說：生物界的現象原來是複雜而且點滴

進化的，所以人類現象也是複雜而且點滴進化的。（「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一三的大意，下文再論。）

歸根結蒂來說，我的意思不過是像下面的要點：

自從中國舊社會漸趨解體，而一直還不曾建立起健康自主的新社會以來，知識份子中稍能以學術自見的，（除去篤於所學與所信謹愼自處的以外）大抵不僅擺脫不掉「學而優則仕」的老病根，而且還墮落到失去了舊時士大夫「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更沒有爭取現代民主政黨政治的勇氣，而不過只喜歡抱着學術的琵琶，笑媚權要，從而討點鄙俗的自滿。笑媚的搬弄可以多姿，權要的性質也可以不問，甚至於不問它是同族抑或異族！所以嚴幾道可以爲袁世凱「籌安」，周作人可以爲日本「總監」教育。胡博士今天正臨着這相同的險關，尤其是在這美國獨佔性資本家集團還不肯放棄以軍事經濟的雙重威力迫使中國甘作附庸的政策的時候。胡博士未必承認這是「險關」；然而對於不能接受這個政策的中國人卻決不能忍受胡博士可能做出比嚴幾道，比周作人還更技巧，更積極的表演。

所以，我們今天值得清理清理胡適博士的脈絡。

〔註一〕這Anthropocentrism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歐洲生物學界易犯的一種不科學的傾向，動輒喜歡輕率地取生物界的現象强與人類現象類比，說明生物學研究初從經院派哲學裏蛻化的思想

痕跡；與後來哲學上的Humanism並非一事。至於有些哲學家如柏格森，如杜里舒等則竟從某些生物現象作整個哲學思想發揮的根據，那就純屬哲學範圍了。

二　論其人的特性和通性，並勾畫輪廓

清理胡博士的脈絡，在今天已經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第一，作為學術文化領域中一位學者來說，胡博士的著作等身，其中除去專門性質的中國哲學史以及古籍考證以外，大抵都流露着一種「孔雀開屏」體的風格，炫耀之氣撲鼻：不是一再申述「……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文存」一集二集自序），就是「……還積下這五十萬字的散文，合計也有一百多萬字，總算還有點成績了。」（「文存」三集自序）甚至於就專門性質之作，論中國哲學史，他說是旁人休想跳出他的掌心，意思是要見其大；而一般古籍的研究却又以「一點一滴」為最高的真理，而且還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而且「考訂一個古字的真偽，其價值不在天文學家發現一顆天王星以下」（這是齊物論的翻版，却不是科學）。胡博士論梁漱溟氏的哲學時曾招來梁氏致書中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之譏。論張君勱氏的哲學則「我揪住了這翻過來的一襪，仔細一看，原來他仍舊不曾跳出賽先

生和邏輯先生的手心裏！」（均見「文存」二集卷二）至於他初期盛名之下，曾經請過梁任公批評他的中國哲學史，而會後在講堂裏竟能對學生說出這樣的話：「梁啓超的批評，混賬之至！有的同學說要打他——我看那倒也可以不必。」總之，作爲學者來說，胡博士的態度並不「科學」，意氣的排他性極强。這不只是他尊重的美國的杜威和中國的樸學家所不屑爲，寧近於中國文人相輕的舊習，而那露骨的自炫與排他，甚至於以出產多少字數作爲治學的成績，倒使人嗅出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裏面商標廣告的氣息。這就牽聯到——

第二點不愉快的事。像胡博士這樣氣質的學人，必不甘以學術自了；而作爲立言論政，立身行事，乃至「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這一方面來說，他却墮入了我本文第一節裏的兩點理由之內，爲了自己的利益，惡化社會的影響。一方面，他宣說：「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道出他是喜歡文化與政治雙管齊下地努力的。另一方面，儘管他口頭推崇易卜生主義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實生活上却總在那裏標榜同氣，不問主張，但有權門可傍，只須「弟兄們」斟酌着如何求售，不計其他。這種文化中人不負政治責任而必須問政的「獨立精神」，多年來出現在中國的政治商場，充分反映出不幸的中國的不幸文化。這種解釋無需乎牽聯上胡博士口頭上

推崇的自然科學，倒是近代進步的社會科學很容易加以說明：從內外雙重壓迫中推動着的中國社會，上層知識份子大抵依附着少數階級的統治者奔走勞心；留學生們尤其便於自私，儘管多少還保有學術的興趣，總難有趨赴再造中國的勇氣。胡博士是更標準的代表，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度裏面現象之一例而已。他們最好標榜獨立與清高，這種「獨立」的表現，就不只單從正面擺出那豔麗的「孔雀開屏」，而自然也就有時陳設出「錦屏」後面那排糞的肛門來了。

清理出胡博士治學，立言，以及作人的特性與通性以後，我現在想先勾畫出他的脈絡的輪廓：——

胡博士的年齡沒有趕上滿族朝廷的科舉取士，十四歲從動盪不安的故鄉到了上海洋場來求「新學」。「從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受了時報的許多好影響。」（「文存」二集，卷三，頁五）這時又承戊戌政變失敗之後，正梁啓超氏解放文體論政論新學的文字風靡若干年，像胡博士那樣改良主義氣質的知識青年，自少就容易接受這些不肯根本反抗現狀而只點滴修正愈趨愈惡的思想。地下革命的孫中山，一直不曾引起他們的注意，那是必然的事。不久，美國留華老傳敎士 Smith牧師向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議退還中國庚子賠款，「拯救中國靈魂」招收中國學生留美的計劃實現，這方興未艾

的新型資本主義國家的「攻心」政策自來就比甲午戰爭擊敗中國那種「以力服人」者高明。胡博士得到機會留學美國，這就培植了他一生業績的基礎。

留美求學生涯中所學幾經改換，由農業而經濟學，由經濟學而哲學。據胡博士未發表的一部份藏暉室劄記裏所載，這時期這位關心國事的青年留學生願望回國後能以梁啓超氏那樣的新聞記者自見（這是胡博士回國後不久在北平允許他姪兒，思永給我看的文字，當時是我很興奮的讀物，我今天的印象只記得略存疑問，何以胡博士留學時期欣羨的人，回國後反而有點鄙夷他？）。由於中美兩國國情的懸殊，胡博士一方面對於美國社會的一切作無批評地接受，一方面又留有中國舊時典籍的根底，對於中國的文學與哲學更感興味。所以他對美國人論「先秦名學史」而一回中國就講詹姆士杜威的實驗主義。這種兩邊不接頭，兩邊好賣弄的「文化」作風，幾乎是二三十年來許多留學生們登龍祕訣的第一信條。胡博士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

他「學成」回國正當中國舊文化裏陶鑄出來的兩位卓越代表人蔡孑民、陳仲甫兩先生輝煌事業發軔的時期，兩先生又都給胡博士以培護與揚掖，三四年期間胡博士頓成中國文化界的新寵。這時期又當歐戰及其後的疲敝，西方帝國主義者無暇高力箝制中國，中國開明的上層社會普遍有了突進的要求，胡博士在蔡陳兩先生旗幟之下以方興的銳氣着實盡了一番摧毀

封建舊文化的文字之勞。然而淺嘗即止的胡博士，氣量既不能如蔡先生的「兼容並包」，改革的要求又不像初期陳先生的熱忱勇毅，所以在蔡先生不容於北洋軍閥，陳先生倡導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胡博士就開始「維持既得的權益」，集合他自己同臭味的朋友（也就是大家盛說「我的朋友胡適之」的時代）推行他的一套作風。誠如胡博士所說：「社會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許太高了」；從此胡博士傾向於惡勢力的保守，大家看見他混沌了新舊的陣容，連談「主義」都得受他惡毒的嘲笑了。胡博士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擴充到英美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羣了。「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爛調慢慢也掛上了胡博士的嘴角了。並且遠在民國十一年的十月，他就「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二八，旁邊還加密圈）。王寵惠博士組織的就算「好人政府」，段琪瑞的善後會議，也可以算是政治發展的正途，應當參加了。

待到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震動，胡博士更厭惡了談主義的人們，跑了一趟歐洲，曾經和他的朋友們計劃過阻撓。北伐「成功」，不料情形反而更好，所以他的「人權」之論，「任何政府卻有權消滅要反抗它的人」了。

胡博士聲譽更隆，交結的英美朋友更多了，太平洋兩岸的大事胡博士都有權在太平洋學會發言了，教他從何感覺到世界上有什麼「帝國主義」？

抗戰這件更大的震動。胡博士的反應更容易想像，他在廬山茶會直到「八·一三」前夕的南京都是力實抗戰之不可的評臣。接着先以文化專使，繼以駐美大使出使花旗國，胡博士第一次出山爲官。其間曾以誣游擊隊爲「土匪」的談話驚駭一時。「勝利」後一年歸來，眞除北大校長。

在這簡略的脈絡裏，我提出了他少年時對新聞記者職業的愛好（爲了這個理由，我不得不提出他並未發表的文件作證，還是理解胡博士的重要鑰匙之一。）因爲胡博士一生的抱負，始終還是最近於代表中國買辦階級的立言人。所以，還比不上梁啓超氏的偶爾也還流露眞性情，也所以他聲譽初立就看梁氏不上眼。機緣安置他高坐文化之宮，轉以文化「新道統」承繼了蔡孑民先生的遺產，其爲必然污損了蔡先生的遺澤，與政治上的「新法統」之污損了中華民族解放的大業，情形正復相同。胡博士有幸得以不必由記者身份顚倒操勞，到今天我們只能認定他不過是文化宮廷內的一員政學系巨子而已。

三 「拿證據來！」

「誰不曾從憂愁中喫過他的麵包，不曾從眼淚中度過他的夜半以待到天明，誰就不懂得神明的力量！」——歌德語。

「不懂得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就不能了解近代文明。」——高爾基語

胡博士和他同年代的一般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出身於沒落了的仕宦書香之家。但他卻辜負了養育了他的中國，而只完成一副畸形的發育：一場留學，成就了他的「中興」；以少年而享盛名，一生只肯從粉紅眼鏡裏看世界；天賦他以小聰明，一生也只肯在個人的粉紅事業上追逐；販得一套市儈文明，更揉成買辦體裁的惡態。悲慘際遇中，爭求解放的中國，何能以文化之任期望於他！胡博士的脈絡只能有上面那樣的輪廓。

現在我們再分作幾個階段簡略地溫習胡博士這垂老的一生：——

（一）「新青年」時代——翻開「胡適文存」的第一篇，他以一個海外讀者給「新青年」編者陳仲甫氏的通信初見於中國論壇。他那時口氣還是非常謹慎謙虛的。經了熱情的陳仲甫氏一篇「文學革命論」的有力聲援，佐以錢玄同氏文字學家的充實，胡博士就一躍而成為堅定自信的一員「新青年」驍將。甚至熱火內斂的大師如魯迅先生也禁不住為此文化戰陣作幾聲「吶喊」。當時的絢爛，可謂極矣！無如一方面，舊有文化到此時已經腐朽不堪，缺乏有力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更有舊文化中精英的耆宿如蔡孑民先生又承受了歐洲大陸的文化，挺身作革新者的保姆，這纔教「新青年」代表的文化內容一時贏得了勝利。其實，到今天認真分析起來，極盛時代的「新青年」畢竟只完成了一場急就性的摧枯拉朽的戰功，而並

不曾向舊有文物作完整體系的批判。僅有李守常先生一人深湛純篤，留下了這個方向的初步研究。於是使得當時文化建設性的工程，教胡博士乘隙作了輕工賤料的塡補，大家也竟一律聽其無批判的揄揚。如果我們從一種文化運動的產生，必然和當時民族生活的客觀條件相關聯的這個觀點來看，這情形是和那時代的中國國情有關的。那時代正當歐戰期間及其結束後西方侵略者的疲敝之秋，只能允許幻覺的中國資本主義作這樣脆弱的表演。也所以極盛時期一過，「新青年」諸子不得不分道揚鑣，連保姆的蔡孑民也終於被逼出走。可是機警而佻㒓的胡博士却就隨着國運的坎坷多故，就自以爲當居「新文化」的「正統」。謙沖之德早經離去了他的筆端，狂放的調頭充滿了他的文字。請讀讀下面這樣的說法，當時胡博士該是如何地妄人說夢：

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在最近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遠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富的果。

杜威先生眞愛中國，眞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中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

好友；對於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文存」二集，卷二，頁五三三——五三六）

不是麽，這些話假使不是從「胡適文存」裏面抄出來，而再將「杜威先生」換上一個其他的美國人名字。簡直就是一副基督教青年會的牧師的口吻？——眞的，今天「愛中國」與「愛中國人」的美國人太多了！誰敢說胡博士的預言不靈驗？胡博士的恩師的威名早將胡博士扶上中國「正統」文化的寶座頂端了。只不知道今天的美國抹殺了中國人民併肩作戰的友情，反以附庸與殖民地看待中國，倒底還有多少學者肯替中國作「譯人與辯護人」？胡博士是清楚的，他們該有不同的「辯護」方法了罷？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我們說的「新青年」裏面胡博士輕工賤料的建設法的文字。（上面一段也正是標榜之一）

例如，他初期的文學論文中，他可以混含詩和短篇小說的分別，竟將「上山採蘼蕪」，「石壕吏」，「琵琶行」等詩當作短篇小說看。這簡直是整個對於詩的否定，胡博士的胆量實在驚人！在那結論裏又說「寫情小說」，「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字最近的趨向，其理由眞妙不可言：

「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

（「文存」一集，頁一九八）

這高見眞赤裸地暴露出胡博士理解的美國人生活，大家都只爲了工廠老板們的恭喜發財「一天忙似一天」，不需要精深的文化享受。「也不能不講究經濟」，那何不爽性「經濟」到連「寫情小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也一齊不讀它呢？「生活競爭」老是這麼忙法，其意義是不是就是爲了老板們稱霸世界，征服殖民地呢？假使這文明教會了旁的國家，生活競爭都像美國人那麼忙法，那結果只有忙出國際戰爭來的。那麼，世界文學的趨向，不就是指明無窮的殺戮麼？只可惜連胡博士所崇拜的美國也就還有違反這「世界文學的趨向」的許多作家，他們仍然以創製「長詩」，「多幕劇」，「長篇小說」爲嚴肅的工作，而並不顧到讀者與觀衆的寶貴時間。胡博士的這高論，多年來一直沒有見到修正，而仍然排擡在重版的「文存」裏面，可見得他的「大胆的假設」是並不一定需要「小心的求證」的。

胡博士的「生活競爭」也是很忙的，所以他屢次聲說他「以哲學爲職業，以文學爲娛樂」，可見他是只能忙裏分閑，享受「娛樂的文學」的。但是，「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是不是應該替「忙人」打算，都以娛樂性爲依歸呢？

至於胡博士作爲「哲學家」看家本領的「實驗主義」，以及他畢生著作中時常强調的「實驗的方法」，據他說是脫胎於「科學」的，那値得專文討論。這裏姑擇要提出胡博士不厭

反復述說的精義三要點，加以檢閱。例如，他說：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學理，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眞理的試金石。……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眞進化。（「文存」二集，卷二，頁五三五）。

這些話對於稍有科學素養的人看來，簡直是文字游戲，而且重心顚倒。第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到底是怎樣的「事實與境地」？又如你「下手」法？還必得分門別類，視各不同的科學以及各科學發展的不同階段，而各有具體的內容。僅作字面的提要勾玄，必然流於無意義空洞思想而已。第二，一切學說學理，一切知識誠然「並非天經地義」；但是科學態度之處理它的問題，假使沒有事實的正確認識，沒有學理的精神準備，沒有從事實中透見某種關係或規律的假設，那就即使面對着豐富的事實材料也無從下手研究。其結果「天經地義」固然得不到，就連點滴的知識也無緣獲得。第三，實驗誠然是「眞理的唯一試金石」但是這精義仍然與第二點有關，要緊的實驗「什麼東西」？如何實驗法？希望從實驗裏得到什麼結果？這決不是空喊「實驗神聖」的符咒就算盡了實驗的能事的。至於「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才是眞進化」，更不知道出於什麼科學典籍？首先，什麼叫做「一點一滴」？這

點滴用什麼標準來衡量？蘋果墮地，可謂點滴了罷？但是到了牛頓眼前，却透見了，而且證定出，說明天體運行的定律，而對於空頭思想家，則雖有這樣千萬點滴陳於前，也仍然做不出「眞理化」來的。至於達爾文的一點一滴，要不是他從中透見了物種演化的觀念，達爾文將終於只是一個博物採集人而已。

總之，科學史上只能留下科學眞理發現者的名字，而並沒有空頭「方法家」的地位的；思想家要承受科學家的啓發，也必須透見科學家思想歷程的甘苦。這是一。其次，紜總萬彙的點滴事實對於一個科學家並不可貴，他寶貴的是透見出事實之間的關係或規律。第三，科學家並不盲目地「爲實驗而實驗」，實驗本身並不神聖，他寶貴的是通過實驗而得到他所透見的事實之間的關係或規律的證明。第四，實驗科學家一定得承認現象的「必然性」的原則，這纔能着手假設與實驗；而決不是信手亂碰，碰到那裏算那裏的。第五，够得上稱爲一個科學家的人，他不只是勤於實驗，同時也一定長於理論，以指引他的實驗，而決不是實驗家與理論家拆開成兩種人的。這些本都是稍知科學研究內容的人無不了然的道理。胡博士奉爲神明，半生半世的文字中總那麼「無」處不是實驗主義的應用」以推崇的「科學態度」與「實驗的方法」，却與科學所眞寶貴的態度顚倒了重心；他要人不重視原則性的假設，要緊的倒是一點一滴的事實，於是而他的「實驗主義」就成爲點滴主義，無原則主義的空洞名

辭。這無原則的點滴主義，又可以稱作瞎碰的實驗主義，實在是與科學的實驗精神並不相干的；至多只能說是貌似的科學態度。這一點正好說明胡博士即使在思想上也只肯以點滴自限的告白，他只能算是一名思想的攤販，更不必問他的實踐生活是否忠於所言了。

胡博士談中國哲學史還知道說「一種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偏偏對於他迎神似地接進來並且迎神時候就預定了要在中國「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富的果」的「實驗主義」，却只扳親帶戚地說了些學派關聯，而並不提及產生它的社會意義與根源。究竟美國社會何以就產生這樣的哲學的呢？胡博士是不知道？還是不敢說？抑或如一般留學生的通病，爲了回中國敲門，不便說出底細？三者必居其一。

試再抄錄兩句看看：

杜威先生的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經濟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文存」二集，卷二，頁四五〇）

又如：

眞理所以成爲公認的眞理，正因爲他替我擺過渡，做過媒。擺渡的船破了再造一個。帆船太慢了，換上一隻汽船。這個媒婆不行，打他一頓拳頭，趕他出去，另外請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

這便是實驗主義的眞理論。（「文存」二集，卷二，頁四三六）

我們今天讀這兩段文字，我以爲大家都容易理解這的確是道地美國貨，胡博士的筆也眞能傳神，「老美」需要眞理與生活，大抵也就是這樣一回事。人間何嘗有什麼煩惱問題？隨時「應付環境」，就是哲學了。今天的中國彷彿到處都嗅得出這麼一般味兒來，充分指陳美國對華文化政策的「成功」，胡博士一個人的介紹之力並不能顯這麼大的神通，但他總算盡到了他的一份心力就是囉。如今美貨到處傾銷，連「眞理」也都是這麼價廉物「美」。不錯，「生活即是應付環境」，應付不下又該怎麼辦呢？例如沈崇小姐受汚那一案，她在東長安街頭所處的那一種環境，又該怎麼應付法？「帆船太慢了，換上一隻汽船」；假使連帆船也沒有得坐的，又該怎麼辦呢？再如，推論到中國的問題來說，抗戰以前，日本「那個媒婆不行，打他一頓拳頭，趕他出去，」今天勝利以後，「另外請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遇事聽大媒主持辦理，是不是就算得「實驗主義」式的解決事中國問題，還或者又只好「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才是眞進化」了罷？

果眞胡博士所頂禮的這一份哲學思想，確乎竟是美國思想的主潮，那無非說明這是 Yankee Culture的一面，連舊大陸資本主義我的哲學所從蛻化的封建文化的老痕跡，一齊都要洗得乾乾淨淨，擺脫了舊大陸的思想拘束，在遍地都是黃金的新大陸上，老板們殺盡了紅

人，役用了黑奴，一天到晚恭喜發財地傭忙。「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這「經驗」有多麼深淺？這「環境」有多麼大小？都可以不問。胡博士只須誇耀不作古人的奴隸，可就勸人不妨作美國的奴隸；也像美國(有錢)人一樣，不用管奴隸們的苦惱麻煩。這裏我還不妨舉一件實例：美國是以各式企業「大王」爲最高社會權威的，那位煤油大王的老太爺，在晚年受人慶賀的一度集會裏，述說他教育這位大王的哲學，就是專好對他指鹿爲馬說黑爲白，讓他受氣，讓他不服，這樣他就懂得如何奮鬥，如何「應付環境」。——所以，老板們說：大家有工可做，有飯可吃，這就行了。這就是哲學。大家應付工作，應付飯碗，就够值得一點一滴研究的了，這就是實驗主義。

如果我們稱呼像這樣的一份 Yankee Culture 爲市儈文化，是不是應當算唐突？「新青年」時代無批判地聽這份哲學囂張，正是當時中國新舊兩份文化界的羞恥！但是這也就反映了當時一般的中國社會生活的實況。「新青年」既然已經對舊有文化作了摧枯拉朽的突擊，已經驚擾了那壓迫中國進步的內外雙重勢力，這勢力勾結着不容許中國解放的力量再作堂皇正面的發展：這時候塡補上一份買辦化了的美國市儈文化，恰正好是胡博士的任務。

（二）**「努力」時代**——既然「新青年」以猛烈而堅定的抨擊舊文化的精神告白其歷史的使命，同時又可以朦朧而脆弱終於難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的緣故而趨於解體，

那麼，作爲「新青年」時代扮演了那輕工賤料的理論建設者角色的胡博士勢必只有另起爐灶，繼續努力，於是而先有「每週評論」，後有「努力」週報應運而出。經過了十七個月的「努力」，（從十一年五月到十二年十月）終於不得不停刊以後，由胡博士一封信裏更明白道出了「努力」應當自許的新使命，更見出暴享成名的胡博士已經愈趨愈衰，而却仍舊想繼存「道統」的雄心。那信裏的要點有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文存」二集，卷三，頁一四三）

胡博士的努力是黯然地失敗了，這告白已經就是強弩之末的可憐的戰士盔甲的碎片。「努力」一出馬就露出了它的一臉乏相，告白了它的貧乏與必然的失敗，那就是一「亮箱」就遭遇滿場倒彩的「好人政府」的宣言，戲碼叫作「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國民問政而以「好人政府」爲號召，其昏憒可笑正和病家求醫而只尋求一張「好藥方」者相同。除去社會憑藉與社會聲譽不算，這口號與相先後時期誕生的那個國家主義派喊出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政綱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爲世界上決沒有一種政治要求可以用提倡「壞人政府」相號召，也決沒有一個政治集團可以採取「內擁國賊，外迎強權」作政綱的。——請「好人

政府」派與「國家主義派」的一對孿生寶貝都在「新青年」解體以後產生，而且直到今天都還以相彷彿的政治姿態「現報」，也是很值得從社會背景上加以玩味的。

胡博士未必不知其然，而却要這樣的作法，這就宣告了他不只嚮望進步的任務已經中絕，而且甘心作逆潮的推波外瀾者。這種格調用之於輕工賤料的理論家胡博士原不足怪。只是一個剛滿三十歲的青年，淺學不思，就敢於自炫「天下之道皆備於我」，時時以「得君行道」之渴望暴露於人世，而且時時以這樣的文字積成多少字數，重印多少版數，詡其「孔雀開屏」之姿，這眞有如他自己所說，允許他這樣作法的「社會太慷慨了」！

這一階段中胡博士的文字以「我的歧路」與「問題與主義」兩文爲畫龍點睛之作。前者告白了「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佔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文存」二集，卷三，頁九五）又說：「……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其實大部份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談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於是「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均見「文存」二集，三卷，頁九九）可見得胡博士的「實驗主義」與「問題與主義」是他的思想的一「體」一「用」，自成明白的體系的。現在試檢拾他不厭其煩，屢次向「少年朋友」推荐的「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中心高見來看兩段：

凡是有價値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眞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爲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他又說：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只可當作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取啓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眞理。如此……方才可以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三二——六三三）

至於爲什麼要有這樣的高見，而且還構成胡博士後來「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的精義呢？照他自己說，「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文存」一集，頁四八二）

今天我們抄錄出這樣的一堆廢話，單只從字面的邏輯上考察，已經可以得出幾個有趣的疑問與理解：

第一，「問題」與「主義」竟是適然對立的名詞！不包含問題的主義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東西？這已經就很怪。再說，研究問題是那麼艱難，那麼鄭重的偉業，而談主義却不過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那麼，胡博士一切努力都是「在各方面應用」的「實驗主義」豈不太受了委屈麼？這明明也是種「主義」呀？如果我們一定要爲這矛盾強索一解，勢必只有承認世間惟有「實驗主義」是享有獨佔特權的一種「主義」，是人人應當「迷信的抽象名詞」了。再如果翻譯作商業廣告術語，這倒是很像「道地來路貨」「本店獨家經理」這一類的調頭兒的。假使實驗主義裏面竟也包含有問題，那麼，所謂「多研究問題」者，也只有實驗主義的問題纔始是唯一無二應當多研究的問題。這樣，我們就又回到「一點一滴」的老圈子裏面去了。

第二，「沒有什麼用處」的主義都是「外來進口」貨；那麼，難道「實驗主義」這一項貨色竟是土生土造，並非「外來進口」的麼？抑或因爲這是「現今歐美很有勢力的一派哲學」，(「實驗主義」開頭第一句）這纔應當奉爲「天經地義的信條，金科玉律的宗教」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尙且是「很危險的」，惟有實行實驗主義則可寫包票至妥至當，保佑信徒們福壽全歸，這實在是「包退回換的上等貨色」！

第四，研究問題，必須要下那麼一步，兩步，三步的功夫；這些工夫裏面還得要「根據一生的經驗學問」，「用一生的經驗學問」，纔庶幾乎可以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眞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但是，胡博士的這高見，又是至再至三誥誡「少年朋友」的，那麼，究竟這是短命的少年，讀着胡適博士的文字時已經就算有了「一生的」經驗學問？抑或他要等到老年積得了「一生的」經驗學問時這纔回想起這「一步，兩步，三步」的研究工夫呢？但是「眼前」的這個問題又該怎麼辦呢？而且還得要「加上想像的能力」，這又是一個什麼玩意兒呢？萬一沒有這副「能力」，又該怎麼辦呢？譬如，沈崇小姐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大學生，可謂「少年」了；她那不幸遭遇的難題，應該怎樣根據她一生的經驗學問來解決呢？又如，中國多的是「終歲勞動而不飽，豐年不免於死亡」的老年人，他的「一生的經驗學問」又該怎樣「用」法纔能解決他隨時發生的「眼前」的困難問題呢？

第五，可見得不管「研究問題」也罷，「談主義」也罷，總之是只當用作「啓發心思」的玩意兒，切不可「停止思想」。而且，不停止的思想也還是不能亂跑野馬，莫碰上了「很危險的」紙上的主義。不信，請看胡博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時在民國十九年回憶上面敎條的警語：

這些話是民國八年七月寫的。於今已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

殺死了，一個也頹唐了，但這些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一一都顯現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誠懇的把這些老話貢獻給我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他們不可再走錯了思想的路子。（「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三三）

這裏面所說的「一個被殺死了」的胡博士的朋友，就是指的被軍閥張作霖絞殺了的愛國老英雄李守常先生，而那「頹唐了」的，就是晚年墮入魔道的陳仲甫氏。這錯處並不在殺人的刀，而在這刀下的人頭；依照胡博士的說法，他們得到這樣的「孽報」，「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文存」一集，頁四八五）

支離破碎，矛盾雜出，十足暴露出「實驗主義」應用的破產！

那麼，我們再看，「避易就難」的胡博士在這一階段擔任的「極困難的」問題的研究罷。仍然就「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談政治來說：除去「努力」週報上面由胡博士按期必寫的「這一週」一欄，隨時提出研究的「寶貴」成果以外，對外問題是「奉勸我們的朋友……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其研究具體的問題的結果，是：「如果英國人眞肯援助吳佩孚，京奉鐵路上的運輸，決沒有那樣便利的。」（英國人眞傻！）「至於說美國不願意吳佩孚的廢督裁兵計劃的實現，那更是說夢話了。」（還是美國好！）實驗

主義的胡博士言必有據，這些代英美立言的說法，必不是信口空談，的確，「當時我們知道，北京英國使館曾派人去勸他——「他」指吳佩孚」（引文均見「文存」二集卷三「國際的中國」）可見軍閥混戰聲中，他們當時就能知道英美在幕後怎樣牽線。至於對內問題，則大抵每當北洋政府讓外來牽線人時常鬧得走馬換將的時侯，胡博士總要迎面喝一聲彩頭：「我們對於這個新政府，只有下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尤其憂時心重，情見乎辭的，是「我們很盼望……吳佩孚、蕭康、高恩洪一班人此時……應該鄭重的想想國家的大問題……日暮途遠，……你們不要糟蹋時間，時機是不等候你們的」。（「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五七）

實在地，這「一班人」眞辜負了胡博士的忠告善道，他們就不想到那些「避難就易」好談主義的人們，談着談着，也就快「談」出國民革命的北伐來了。

（關於從「新青年」轉換方向努力這一時代中，胡博士研究有得，而應用到實際生活上面的有三件事，不妨附帶述及：一件是他經由他的英國朋友莊士敦介紹覲見溥儀，一件是他廢棄了那背後釘着「胡適自用」的銅牌子的人力車而改置自用汽車。實驗主義者的胡博士對於這些經歷了「一步，兩步，三步」的思想功夫而後採取的「最滿意的解決」，都有過響亮的說明：對於前者，他留下「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的名

實：對於後者，記得在當時的「努力」上面也有文爲證，總之，「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認這個物質的享受的重要」，是胡博士多次啓迪後生的重要思想，他自己就總在那樣實驗給後生作榜樣。至於第三件事，就是胡博士當年曾經想以盛名教授博換一名熊希齡內閣裏的教育部次長的地位，而結果竟沒有成，胡博士也竟沒有留下實驗報告。）

（三）北伐及其前後——胡博士從他的「歧路」裏躍身出馬來談政治只不過是上面所述的一套思想與作風，安然拒絕了「新青年」時代的朋友們勸他「不要延長惡政府的壽命」的忠告，一心只願「垂涕而道」地走向馬燈式的北洋政府奉獻條陳。到頭來他自己參與了的「善後會議」，既無補於段祺瑞政權的滅亡，「好人政府」派的健者「我的朋友丁在君」出差了一趟「淞滬督辦」，也挽救不了孫傳芳聯帥的崩潰。而臨着北伐的高潮，胡博士單憑「啓發心思」解放了「迷信」以締造的空中樓閣，不得不彷彿從思想上一片片坍毀。總之，既然中國在「吃飄泊的苦」，胡博士也就不得不小作「飄泊」：於是我們的胡博士這時候就有十個月的世界漫遊。——對的，還是他自己選擇的「漫遊」兩個字妥當，說「飄泊」不太唐突了我們的「文化巨子」？一個國家讓胡博士「飄泊」，那還成個什麼國家，那怕這個國家自己「吃飄泊的苦，儘够了！」？

要清理這一個中國動盪的大時代中的胡博士，照理本該再分作幾個小階段來敍述；但爲了節省文字，而且從前面兩個時代中我們已經領略到胡博士的神韻的要點，就不妨依序先扼要一說，再補充些事實根據：北伐期間胡博士恰好作「世界漫遊」，先歷與北伐頗有道義淵源的蘇聯，這新國度居然也不錯，但倒底還是不如「往西去！」歸來直到淸黨事定，胡博士對當朝勢力是擊笑交替爲用，好在「我的朋友們」又一個個先後入朝，仍然不妨「獨立」評論一番。然而仍然有許多人要高談主義終究是可笑可恥，帝國主義是走遍了世界也找不着，最好還是大家照照美國的鏡子；倒底這還是胡博士脈絡的主幹。這樣就推移到了抗日戰爭。

胡博士的漫遊本負有一重文化使命的，就是去倫敦參加庚款委員會。「歐遊道中寄書」與「漫遊的感想」裏面保留下許多寶貴材料，例如：

> 國中的「新政客」有二大病，一不研究問題；二不延攬人才。近來我想，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理想主義。我們……若談政治，若幹政治，決不可沒有一點理想主義。（「文存」三集，卷一，頁七三）

可見得北伐役中的「新政客」必須懂得「延攬人才」，而且除了必須是「好人」以外，除了研究問題之外，這回還得要有「理想主義」，而且只要「一點」理想，這纔庶幾乎可以算是免於毛病的新政客。假使這理想主義裏竟包含着不只「一點一滴」的問題，那我們幾乎

要疑心胡博士「思想」上這時候經驗了一次革命！又如：

我們這幾年在北京實在太舒服了，太懶惰了，太不認眞了。……因爲你們以爲我在上海的生活太Frivolous。但我現在想起來，我們在北京的生活也正是十分Frivolous。

（「文存」三集，卷一，頁七八）

這眞叫人讀起來喫驚，不知道是胡博士的懺悔，也不知道是他的天才要轉向！像他那麼「努力」研究問題的人，居然自號爲「十分Frivolous」！且夫Frivolous一字，源出拉丁，英文習慣裏並不常用；因爲義訓爲「輕薄」，是英美紳士們「不至於」犯的毛病，而倒是拉丁民族習用的一個形容詞。

那麼，胡博士應該怎麼辦呢？據他說：「我在莫斯科住三天，覺得那裏的人……眞有一種『認眞』『發憤有爲』的氣象」。但是蘇聯又只有「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成績是應該研究的」，至於「如革命時期，如一九二一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文存」三集，卷一，頁七七）姑無論胡博士到底研究了蘇聯「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成績」沒有；但何以這以前的「皆不能不撇開」呢？「歷史考據癖」又跑到哪裏去了呢；是不是這「歷史癖」碰到了「革命」，碰到了「大災」，就魂飛魄散了呢？抑或只是這麼說說好聽？好個尊重事實的「學者」！

結果胡博士還是「往西去！」頌揚美國「汽車的文明的好處眞是一言難盡」。（同上卷，頁五六）但他在同上一信裏又說是「我們應該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同上卷，頁七九）假使這時候眞有一個崇奉胡博士的中國少年追隨着胡博士一路旅行，而且假使他「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我相信他很容易研究出這時候的胡博士對於任何强國都願意學，無論是英、美、德、日、意、乃至「一九二三年以來」的蘇聯。再假使這個少年眞的依照胡博士的讚揚去學習，他要不發瘋纔是一個奇蹟！

總之，北伐與「世界漫遊」給予胡博士的震動眞可謂不輕了。

但這期間却至今還留下一件與當時中國政局有關的大疑案，曾由當年在漢口替武漢政府編輯英文中央日報（The People's Tribune）的林語堂博士寫過一篇題作「天才炸裂了」的文字刊載中文中央日報的副刊上露了一點端倪。文字大意是諷刺胡博士和丁文江督辦，曾經一在倫敦，一在上海，策劃着勸孫傳芳聯帥不必援救吳佩孚，聽其與北伐軍兩敗俱傷，然後由孫聯帥一鼓而俱克之。不想當年革命的軍民的力量發展太猛，竟迅速地連敗兩閥，以至於胡博士的「天才炸裂了」！自然，這疑案即使確有其事，也已經早成陳跡，大度的南京「革命政府」連岡村寧次都可以借重，何況對於美國政府心目中第一號中國名流的胡博士，那並沒有成功而且「莫須有」的往事何足掛齒？不過對於我們此刻淸理胡博士的脈絡的人，不妨

順帶提起一筆就是了。

說到這裏，我想還不妨提出一點似乎難解的疑竇；就正在這個期間，胡博士在連續兩封寄給徐志摩的信裏，一再恨恨其辭地說：「英國不足學」，「英國是不足學的」，因爲「英國一切敷衍，苟且過日子，從沒有一件先見的計劃」。英美同文同種，同列世界巨頭，何以這時候胡博士筆底下的英國，竟這麽一錢不值，至於「從沒有一件」先見的計劃？這決不像胡博士素常的意見。而且緊承在這幾句話的前面，我們還見到胡博士說「我們應當學Mussolini的『危險地過日子』」，（引文俱見「文存」三集，卷一，頁七九）口氣也不像胡博士素常的從容閒適與多少含點輕佻。這究竟是點什麽道理呢？如果不嫌周納，姑且解爲胡博士這時候正慊於英國缺乏「先見的計劃」不作及時有效地援助孫傳芳，（這話自然不能形之筆下，不過責怨英國的情緒不免流露出來）於是就咬牙立定決心，要學習墨索里尼那麽樣「危險地過日子」，那麽，胡博士正是大才槃槃的「政治家」，人們不當以「票友政治家」相看待了。——我要聲明，這是我極度存疑的一種看法。往事無法回頭，如果將來竟不幸而有胡博士以這相同的情況推動美國對於中國的脅迫與奴役，那麽，我這看法就更近於是得到證明的假設了。何況今日「過河卒子」已經宣誓就職，只待「拚命向前」呢？

像胡博士那樣慣常沾沾自喜熱中功名的氣質，是否竟會鼓起勇氣，毅然振起担當上面所

迷疑案的那樣「大政治」的雄圖，固然已由事實證明其空幻，姑不置論，但是「北伐」這一場大事給了他不小的震動是確無可疑的了。震動到幾乎使他根本否定了他過去的一切努力，甚至於「究竟我們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眼看着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裏着實難過。……我們種的新因却在何處？幾個朋友辦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赤化，這又是種新因了嗎？」（「文存」三集，卷一，頁七八）所以「我們應該……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同上頁）「精神」如何「鼓起」法呢？那就是「應當學 Mussolini 的『危險地過日子』」？儘管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館」的參觀也啓示了他不少另一種方式的「危險地過日子」，但那些到底是屬於「偷懶的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於是這時候的胡博士「很想帶點『外國脾氣』回來耍耍。」（同上卷，頁八〇）

不想一耍耍到了美國，到底仍舊是「汽車的文明的好處眞是一言難盡。汽車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這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幸福。」（「文存」三集，卷一，頁五六）好個慈悲的胡博士，自己永遠也不缺少汽車坐，却心裏想念着每個中國人家都有汽車的幸福，眞個是「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我想果眞中國能够像美國那樣地「民主」法，胡博士「鼓起精神」來參加總統的競選，他的政綱只要有這

麼一條「許給每一個中國人家一輛汽車」，那包管沒有任何第二個政治家敢和他競爭！

美國本來已經是地上的現實「伊甸樂園」，這就够消磨掉胡博士漫遊歐洲時鼓起的「危險地過日子」的壯志，何況北伐悲劇又演到了「清黨」這一幕，所以用不着像黑衣宰相的那股精神也就不妨放放心心地回來。胡博士路過日本時，一方面對記者談話，申述其為孫中山的哲學作通俗化的著述的志願，一方面拜訪了那位「日本最有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談論了一通天下大勢得到「一個絕大的刺激」之後，終於勸「朋友們，不要笑那位日本學者。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指去美國）」（「文存」三集，卷一，頁六四）原來福田博士那時候也剛從歐遊回到日本，發現了世界趨勢，「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而胡博士却不以為然，因為他堅信這第三條路正在美國這個天堂裏！於是他好意地奉勸了福田博士「索性到美國去看看」，而福田偏不敢去，這使胡博士覺得非常替他可惜，失去了發現第三條路的幸福。結果胡博士還是更愛中國人，發表了這一度東亞兩大學者的晤見經過，他多得到了一重旁證，美國並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他要以此獨得的「真理」敎化中國人，尤其是那班冥頑不靈，「却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的朋友們。——這就是漫遊了世界一週的胡博士的最後收穫！

既然定鼎南京之後的國民黨政府一心只忙着清黨與剿共的「豐功偉業」，並沒有人上門請教胡博士經過福田博士側面證明的「新眞理」，胡博士就難免要多享受幾天「自由」。在這自由歲月中，所有他在漫遊時候心裏上七八下盤算着的龐雜計劃，如像「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呀，學 Mussolini 的「危險地過日子」呀，動手通俗化孫中山哲學的著作呀，總之是「帶點外國脾氣回來耍耍」的，一齊都抛到九霄雲外，而却含嬌帶嗔地只是高唱「人權」（大概這就是到美國之路罷？）着實向南京皺了幾陣蛾眉。應時的「新月」，俗語又稱作「蛾眉月」的，這時就成了胡博士和他的朋友們從新努力的象徵。「新月月刊」和「新月書店」在這時期的煩囂的上海文化界裏着實添了一股嫵媚。在全國殺伐聲中，請聽聽這樣的句子：「我們捨不得『新月』這名字，因爲它雖不是一個怎樣强有力的象徵，但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着，懷抱着未來的圓滿。」（「新月的態度」）這簡直就像是少女時代的嫦娥下凡，從薄紗而幃後面吐露出來的天上綸音！萬一有人愛憐到這「纖弱的一彎分明」，又怎的捨得教它深鎖眉黛？

總之，由「努力」到「新月」，胡博士不只返老還童，而且像是服過了一帖神異的「荷爾蒙」藥劑，改換了性別了。這就叫作「經驗卽是生活，生活卽是應付環境」，這就叫作「實驗主義」。雖然「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哲學也有弱點，可是高談主義，終於還是迷信

「名教」的罪人，而「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新月」一卷五期）尤其是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中國的病無非是「貧窮」，「愚昧」……等等「五鬼鬧中華」而已。所以最要緊的，還是「請大家來照照美國的鏡子」胡博士的朋友美國使館商務參贊安諾德先生製成三張圖表交給胡博士看，那「第三表是美國在世界上佔的地位，也是給我們做一面鏡子用的，叫我們生一點羨慕，起一點慚愧」。（「文存」三集，卷一，頁三九）愛國之情，誠然可佩，只可惜胡博士沒有說明「我們」之中包含有誰？到底誰纔「羨慕」？誰該「慚愧」？大概又是那「五鬼」罷？

畢竟「皇天不負有心人」，「九‧一八」大變發作了，「我的朋友翁詠霓」早經入贊樞機，瀋陽變作後不到一個月就有「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係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這一場覲見的幕後故事據傳說有許多，總之，胡博士像似還沒有確定地發現出「到美國之路」，偏偏告了某某權要一狀，結果竟至於並不太歡。好在「我的朋友」得到施展經綸抱負的機會的很多，胡博士就不妨應屠戶何鍵將軍之寵邀講學，笑納五仟元程儀，也不妨南遊香港，發表了那「香港爲中國教育中心」的名論，雖然遭遇過中山大學的閉門羹，卻仍然不減胡博士的瀟灑逸致。

後來終於還是「獨立評論」一通，（廿一年五月——廿二年十二月），那引言上載着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可是他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很顯然地，這裏面的自由實在很大，只是胡博士並不再提起幾時再照照美國的鏡子時是否還「起一點慚愧」？原來這「八九個朋友」已經很少在野的，起一點慚愧的大概更應當是屬於別人的了。何況內戰仍舊沒有停，而日本卻愈逼愈緊，「美國鏡子」已經漸漸不入時了。所以儘管領班北平文化界歡送那位退還漢口九江英租界的英國使節藍勃生爵士回國的宴會上，胡博士盛贊這位有遠見的現代偉大外交家，（在不足學而且從沒有一件先見計劃的英國人中，這裏竟出了一個例外！）那究竟不過是一種外交儀節，至於胡博士這期間的驚人名論到底要推下列兩件：其一是對內的，「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可見「人權」已經過時了）又一是對外的，「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分見「魯迅全集」第四集，頁四六三及四九二）這「征心論」一出，也就推移到了胡博士脈絡的第四時期。

（四）抗日戰爭及其前後——這一時期裏大家的記憶都還清新。中國的學術界固然一般的都自恨不會為抗戰有所貢獻，卻也為抗戰疲敝到奄奄一息。胡博士以文化專使的身份在抗戰初起即遠走「天堂般」的美國。九年間他的學術工作，似乎只聽說有整理「水經注」

的若干版本的報導。而戰後歸來，這一場中國大事之後，却偏至今不聽到胡博士要主持什麼言論機關的消息；我們關心的胡博士的戰士生活，固然無法探詢，就連戰後建國的大業也聽不到胡博士的議論。戰前與戰時的報紙資料，私人又不容易搜得。——無已，姑且只憑記憶所及，扼要地而且順依着整個脈絡的理解地紀述胡博士在這一時期裏的言行，完成我這一篇冗長的清理。

既然胡博士的「征心論」終於不會說服日本人，而中國愛國家愛眞理的全國軍民不辭冒死求生，畢竟完成了一場震鑠古今的抗戰，像胡博士這一類永遠不忘記「對不住我們的地位」的人，必然要顯露出他的窘態。儘管他叫囂了半生，否定了有什麼叫作「帝國主義」的欺負中國，「我們要救國……不肯反省，只責備別人，就是自己不要臉，不爭氣的鐵證」。（「文存」三集，卷一，頁八八）一到事急臨頭，這位不但「要臉」而且「爭氣」的胡博士，居北平只曉得慌裏慌張，天天去抱「叔魯，叔魯！」（國賊王克敏的別號）的「佛脚」！日本改造雜誌社主持人室伏高信登門勾引時他纔笑雜作，教人家後來作出文章來示衆，說是胡博士認爲中國要等五十年後纔能抗日，暴露他躭心中國抗戰之情遠較猙獰侵略者爲迫切。（文化漢奸錢稻孫當年安心事敵的理由倒很簡單，他說是「蒙古人尙且能統治中國九十多年，日本何至於會不如蒙古？」這班人在這種時候偏會想念到「五十年」「九十多年」以後

的事，連子孫三代的安全都計劃到了！）待到奔赴廬山吃茶，去南京號叫，仍然是「國際戰爭不是好玩的小事」呀，「罪狀不能堆在帝國主義的頭上」呀，「要爲國家打百年計劃」呀，「應該從思想學問下手」呀，這一大套高論在那裏發揮。不想「小諸葛」將軍已經到了南京，智珠在握的權門就決定了「打打再看」的大計。儘管胡博士再糾合了三十五位「名流」，聯袂叩闕作懸崖勒馬的最後諍諫，終於只好退到「低調俱樂部」裏面頓足捶腕，唉聲嘆氣。

提起「低調俱樂部」來，國賊周佛海還在後來忝顏降敵以後寫過一卷「往矣集」裏面對此有不少的憶戀。這無恥的賊偷，虧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人出身，竟至喪盡心肝，作盡了他力之所能的一串滔天罪惡！這童年少年的寒士，厚負了中國社會養育了他的恩德，不思酬報，反轉教早經死滅了的舊幽靈附體，在他被敵國的屠酋們挈攜到北平的一次，受到隆重軍儀的「歡迎」，他不以爲羞，偏偏自況於可傲中國歷史上的「九五之尊」，活畫出一副舊史書上最卑劣的「揚雄」「馮道」體裁狗彘不如的窮醜像！

然而我們的胡博士却在抗戰前夕還看不出這樣的人畜的肺肝，而偏作了他的「低調俱樂部」裏的一名重要部員，教他後來列爲「佳話」。難道這就是實驗主義式的「要臉」與「爭氣」？

胡博士是廣交英美「上等」人士的「獨立自由」人，所以儘管當時的抗戰國策已定，他

還要在那裏「低調」儘彈；以至於教南京負警備之責的官員不得不勸他出境。好在胡博士又多的是在朝的朋友，於是負了一面專使的文化之旗，鬱鬱地遠去美國。濃烟一陣，汽笛幾聲，奔赴了「天堂」以後的消息，本來就不是「地獄」裏面的人們所能輕易得到。此刻所能追憶的，是文化專使除去在美國社會裏文化周旋以外，最喜和顧少川大使往還。除遇着王正廷大使之一度宦場頓挫，胡博士遂以顧大使的推轂，拜膺了駐美使節之官。膺命時胡博士正在倫敦，當時曾有中國抗戰決不能寄託希望於「土匪」式的游擊隊的驚人談話，激怒過不少的國人。後來大使任內，時常有胡博士和宋子文博士失和的風聲：一個擁有美國聲名，一個倚仗中國實力，兩博士者當時可謂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終於還是胡博士比拗不贏，弄得辭官掛印。

抗戰結束後一年胡博士冉冉歸來，偏是在內戰擴大聲中，偏是在美國堅持不惜以軍力侵佔中國的政策之下，胡博士這回又蛻化成一個新人；他這回不寫文章，不抒高見，竟是三緘尊口。不只不再譴責那班高談主義的「懶人」，却也不肯吐露中國人今天到底應當如何「點滴實驗」纔算得「要臉」而且「爭氣」。胡博士自來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教，這纔總要高談政治的；這回由重洋之外眞的從政歸來，反倒難得輕發一言：難道「學者」實驗了一場之後，連「研究問題」的心得也吝於「教誨」後生了嗎？抑或這回更照透了美國的鏡子，眞的欣幸中國榮膺「菲律賓第二」的寵席有望，這纔「爲政不在多言」了呢？（今日的國立

大學校長，不只是朝廷的命官，而且還負有統制思想的使命，何況胡博士左右有傅斯年、陳雪屛，哼哈二將，本就替一黨培植人才的；所以說他「爲政」也於理可通，他們早就扔掉了蔡先生的傳統了。）

偏偏「眼前」的問題一一逼到胡博士面前，大家好容易纔從新聞記者的筆下得到一鱗半爪的報導。先是「願作小學生，好好學習」。接着是「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胡博士今天總算積够了「一生的經驗學問」了罷？他那「一步，兩步，三步」的思想工夫，怎樣反轉變成這般混沌模稜？

終於還是有些事實教胡博士不得不發表他的研究結果：這有（一）中央研究院在內戰炮火連天聲中，在認眞學術的人士飢寒交迫的境況下，「制禮作樂」，釐定了「博士授與」規則；（二）政府如果給予優厚的營養，而且安定了國家，十年後他準保中國能有「像樣子的大學」。且不說這些杳茫希望，期之於當今的政府和胡博士的亂誇海口，使人憶起了胡博士康價哲學裏的一貫作風；就算依照中美商約第二十條所載行事，美國將來在中國廣布它的學術文化，那也得要等待中國爭求自主與民主的「叛逆奴隸」斬盡殺絕了以後纔始能看得見「苗頭」。印度費了三百年奴役的高價纔產生了像數學家 Ramanujan 像物理學家 Bose 與 Raman這樣的學者，向國際學術界說明印度人的科學智力之不弱於歐洲人。難道中國人還須

再作若干年的美國奴隸爲了將來出產世界第一流的學者？難道世界局勢與中國人民還允許中國還應從容等待？

胡博士於上面這些表現之後，接着就是（三）在所謂「國大」主席台的淺笑鞠躬，「代表」全體國人接受了那一部好「民主」的憲法，而且據他說是這「國大」與「憲法」的精神比美國的還要好！再就是（四）北平美兵暴行的一案。事實眞推演得逼人，我在這篇文字開頭時還在疑問胡博士到底將如何解釋他那「純屬法律問題」的談話的，幾天功夫，終於胡博士還是尊重美國的「法律」而且是臨時性的特殊法，而且還到庭旁聽，手作筆記，而且居然「勝訴」。（是誰之訴？）而且還要當庭握手稱慶！據上海聯合晚報所載：「自沈小姐上訴後，這個問題，就被北大校長胡適以監護人的地位，一手包辦。他與市府外事處商同美駐平海軍陸戰隊組成海軍法庭，根據美海軍的法律程序，受害人沈崇只能當作證人出庭。」——今日域中，究竟是誰家的天下？是誰教抗戰勝利之後的國土上蒙着這種羞恥？胡博士在這場面裏，扮演的究竟算是一個什麼尷尬角色？即使就法律關係說，中美兩國的法律有那一條載着一個大學校長可以强作學生的法律監護人？中美之間竟不需有國格尊嚴的正常外交？胡博士的這種「要臉」而且「爭氣」的行爲，就算「對得住」他的「地位」？總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謂何？「國土尊嚴」之謂何？「國家主權」之謂何？「學術文化」之謂何？「實

驗主義」之謂何？「多研究問題」之謂何？胡博士在行動中都一一給了鮮明的解答了。

此風不遏，在美國獨佔集團中人一相情願，想以「菲律濱第二」奴役中國者的心目中，如胡博士其人者確是「羅哈斯第二」的最適當的人選！

假使我們回憶起當年蔡孑民先生爲了抗議彭允彝在國務院作干涉司法獨立逮捕羅文幹的提議而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那一回事，胡博士慷慨激昂地爲文頌揚，曾仿倪元潞文體，說過這樣的話：

> 士人之行已，寧任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廉隅。今日廉隅毀裂已盡……賣身尚爲之，何有於賣國？宜乎蔡先生之奉身而退，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全也。（「文存」二集，卷三，頁二三四。）

並在同一文中借題替學生干政運動辯護：「中年的知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知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開口了。……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爲中年知識階級縮頭袖手不肯干政。」試判斷以今比昔，兩回事件的情節輕重比較何如？這回偏輪着胡博士處在當年蔡先生的「地位」，而他偏不僅不學當日的蔡先生，也不僅不學一般的中年知識階級縮頭袖手，反倒積極地爲外來暴行張羅掩蓋，表演醜劇。假使沒有終古常新的少年學生們「出頭」「開口」，胡博士還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境

地！眞正是「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夫！充此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蔡先生當日所說的「似此行爲，士林痛恨。」胡博士亦知之否？

這不得不教人想起了周佛海！不得不教人想起了「細菌移殖漸進的毒性」！

四　結語

一、假使說杜威的哲學代表了觀念論哲學體系中在美國社會庸俗化了的一支，所以儘管「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和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一齊抹煞，一齊認爲沒有討論的價値」，卻正說明了蓬勃發展着的美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一種思想要求，因之還不失爲自主社會的一種哲學支派。可是一教胡博士無批判地負販回中國來，也想將中國社會舊有的與新需要的哲學根本問題一齊抹煞，一齊認爲沒有討論的價値，而只成爲他的「點滴主義」與「應付主義」，那我們稱他爲「買辦哲學家」應當不能算是不公。不問中國社會的結構，不理解它向上發展的眞正要求，而只一味地叫賣美國的「頂好」，「汽車的文明的好處眞是一言難盡，」那麼這還夠不上一家買辦公司，簡直只是買辦攤販而已。

二、那以著「新工具論」(Novum Crganum)創導歸納法，在近代思想上開實驗研究的先河的培根，倘且因爲他只能從前代科學家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啓發，闡發新的思想體系，而

自己卻一生動手作過若干科學實驗都得不到結果的緣故，致爲後代科學思想家所譏評。這因爲他的思想重心在於反抗舊有經院派哲學，以致過於推重茫然的事實，忽略了理論與假設在實驗研究上的重要性。這思想輾轉傳演爲杜威的「實驗主義」，因爲它畢竟還能適合美國社會的要求，這纔不至於爲那裏的科學思想家所詬病。然而一經並無科學素養的胡博士無批判地販回中國來，就變成了他的「賭碰的實驗主義」。碰來碰去，碰了幾十年，這「主義」在中國不只不曾如胡博士所預料的「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富的果」，而且連他自己的那一棵獨苗，今天也趨於枯萎！

三、胡博士一來爲他的這「主義」所限，（他這纔眞叫作「抽象名詞的迷信！」）二來他好浮名高於尊重事實，不恥學人所戒的「聲問過情」，（他帶着博士的頭銜飽學歸來，而他那原著談墨家哲學的博士論文竟遭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駁斥。是後來他在中國當年貧弱的學術界一舉成名，這纔又由原來的大學補贈學位，他也就補作了一部「先秦名學史」完卷）尤其是三來他爲中國社會所誤，享名太快。這一切都限制了他在學術上往深度發展，永遠强調着「一點一滴」的成就，是他的最高境界。

四、胡博士也見得到文化學術是在動的發展的那一面，也見得到這發展與社會的關聯；但是由於他的氣質與思想的境界始終達不到高級的智慧，少年時誤於他家鄉人「戲台裏喝

采」的風俗，留學時更誤於美國的社會，遂致直到盛名的壯年看見美國汽車公司業務的發達，以及城市路牌改塗地面爲了夜行汽車的便於辨認，就認爲永遠進步的汽車文明而讚不絕口，回來就對中國發出無出路的恨恨之音。所以他在初期的工作表現還能適合於當時中國社會進步的要求，因之也還肯道出些坦白的心事，例如「戲台裏喝采是很難爲情的事；但是有時候，戲台裏的人實在有忍不住喝采的心境，請列位看官不要見笑。」一到後來中國社會眞的嚮往更高級的境界作沉着的推動，因之也要求更高級的文化與學術時，却就嚇得他往逆流湧退。就連整理國故之業，也只由他的一套「實驗主義」媾合着「乾嘉樸學」送他葬入故紙堆中，不能自拔。又如，初期他還知道活的語言是由健康的民間創造的，後來他高據文化之宮，一聽到人民的要求就破口謾罵：這種時代推進的浪潮本已淹溺了不少的文化中人，胡博士仗着他與反動政治的配合，反而忝顏地自居於文化的「正統」。他一生像是苦心創導「唯文化與學術纔眞能救國」，其實這纔正是「崇拜文字的魔力的宗教」。

五、像胡博士這樣的學人又不肯以學人自限的，其在政治與立身行事上的表現必然只能有本文所清理的脈絡。這脈絡由於敘述一代政學系式的學人，聯帶也就訴說着中國社會一代人在悲慘際遇裏發展的沉衰。

六、我自忖並不是清理這脈絡最適當的人，然而由於經歷了一場抗戰大事之後中國反而

墜入更堅苦的處境，不得正常健康的發育，我亦猶無數萬千平易的中國人民，抑不住我對胡博士所代表的一類人士的憤慨。尤其因爲胡博士尚未歸來時，我曾經幻覺地誤以爲他也應能接受抗戰一場大事的教訓，向我熟識的青年朋友們糊塗地漫寄希望於他；這心情以至形之於筆墨，在去年昆明出版的「民主周刊」上面紀念「五四」時，我甚至假定胡博士戰後的遲遲不肯歸來，還是由於國內政治黑暗以及當權政黨的誤國不休，連起碼的民權都沒有保障，怕的回來不好自處。我爲了要修正我一時糊塗的錯覺，更願意勉力試作此篇。儘管我自勉儘力作客觀的陳述，但我又相信難於完全克服我執筆此時此日的心境，應有不少逸出我始願的地方。回想我自己的心境也正是客觀條件所形成，更這麼讓它發表罷。

七、最後我還附加兩副聯語，爲本文作結。其一是上海某大學的一位教授，也憤於胡博士近來之所行所言作了一聯相贈：「論學問比劉向不足，論無恥比揚雄有餘」。這是取他與古代學人相比的，不免有點冒火。我想還可以補充一聯，平情地綜結現代的胡博士：「論哲學則負販杜威之唾餘而無其誠意，論政治則竄易康梁之舊緒而乏其雄心」。

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寫畢

論張君勱

一 破題

俄國故文豪老托爾斯泰留下過一句名言，道出了他對兩個文學作家的感想，同時也揭示了他對於藝術的意見。他的那一句話的意思是：「安得列夫欲我們害怕，我們却並不感覺害怕。契可夫不欲我們害怕，我們反倒時刻毛髮聳然起來了。」

此刻我在這裏動筆要寫今日中國報紙上時常佔據頭條新聞的張君勱氏，開頭也想套用托翁那一句話的形式和表現法。我的心目中想到中國的一批未能忘情於中國政治的文化學術中人，而想比張君勱氏於托翁筆下的安得列夫。這也就是說，「張君勱幾十年裏大聲疾呼，欲我們關心中國命運，我們却摸不著邊緣；不知道他講的是什麼政治。」相反地，「多少名流矢口不談政治，或者只隱隱約約地吐露一星半點的意見，我們反倒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們的路數來了。」

可見得政治不只是一種科學，也確乎是一種藝術，確乎有巧拙之不同——然而又確乎毫厘不爽地反映出各種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要求。

既然中國的「現代化」是如此其曲折艱難，而國門外的變化又是如彼其浩大急劇，以至於現代化一辭，竟時時改換了含義，不容許中國貪享輕巧的「一勞永逸」之安。這所以多少都背負着「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的文化學術中人，一批一批地教這驚濤險浪淘洗得不成模樣！這是殘酷的，然而這是歷史規律紀錄下來的事實。

假如說這情境要算是民族的悲哀之一，那正因爲我們還肯推重像這一類文化學術中人，尤其是他們也都算維繫過一時的「人望」。其實，中國倒底還是背得動它的負荷的偉大民族，不管這負荷有多麼沉重。所以，中國是並不肯悲哀終古的！可悲的倒是這些人物自己，和他們所能代表的社會階層。

然而，像這一類恰如其分的「學者」政論家，乃至「學者」政治家的作風表現，確乎有爲巧爲拙之不同。而這樣的巧拙之分，形迹上看去固然因人而異，可是細加探索，又幾乎可以說是他們各各都是時代與社會的準確標誌，一一都推溯得出歷史與社會的根源來。這話說得過於抽象，還是舉例說明吧。

例如胡適之博士，我曾經在上篇文字裏，認爲他一生的抱負，最近於代表中國買辦階級

的立旨人。我說他「最近於」，也就是說他起初並不自覺。買辦階級生心向外，它在厭惡舊式混亂的內戰這一點上，是也還可以和脆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所以胡博士應運出馬時，酣快淋漓，乾淨磊落，着實盡了一番摧毀封建文化的戰功。待到喚出反封建原來又和反帝國主義結了淵源，他卻就毫不遲疑地撥馬回頭，矢口否認「帝國主義」的存在；即使民族資產階級長不成器，即使埋入故紙堆中，說是去「捉妖」「打鬼」的，卻終於混和在妖鬼陣裏，也在所不惜。再待到看清楚了中國妖鬼和帝國主義本來是拆不散的冤家，尤其是中國專許給了美帝國主義，他可就更是心安理得，用不着再談政治，自然也就理路分明了。

至於張君勱博士呢？情形又不同了。他遠紹康梁的衣鉢，一生神遊於秦皇漢武的盛世，十足地代表着地主的利益。在這一點上，他要算是「愛國」的；然而今世何世？像這一路的「愛」法，必然地「曲高和寡」。從張氏追溯到梁任公，到康長素，實在叫人感慨系之。假使我們溫習左傳上曹劌論戰的名句，那說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應用到這三代政治家身上，倒是非常恰當。或者抄襲魯迅的作品，借用九斤老太太的口語，這又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康長素以布衣而公車上書，成就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戊戌政變。一傳到梁任公，「筆鋒常帶情感」，也還風靡多年。等待再傳至於張君勱，儘管他苦口婆心，一字一淚地說教幾十寒暑，然而「人心不古」，聽衆總是寥落蕭條，獻身組黨，創導了

「民主」這麼些年，好容易熬到今天，風雲際會，車馬盈門，偏又鬧得故舊割席，部屬攜貳，民間更不知道是誰人惡弄，竟以「君賣」相稱！——這些情形說老話是「氣數所關」，掉新名詞就叫作「階級的沒落」。

事情要像這樣的看法，政治人物的巧拙之分根本並不關重要。因爲既已經被擁作了政治人物，就說明了階級的「氣數」，這氣數是當其朝向上昇的弧線時！它的代表人要作得磊落爽朗；反之，一到弧線下降時，伶俐人不肯出場，勢必只有貌似瘟頭瘟腦的代表人登台替數。所以，所謂政治人物個人的巧拙之分，要深入地理解，只不過是表面迹象而已。

張君勱辛苦耕耘了多少年，一直奉行着「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的孔門遺訓以接物應世，偏偏遭來的是冷落蕭條，室人交謫。直到去年九月，依形式看去，張氏領導的在野「民主」政黨恰正是如日方中，又偏有觀察週刊的記者，評他是「……然而他領導組黨，數年以來，可謂無甚成就。」這可氣得張先生披肝瀝膽，歷數多年來反對一黨專政的大義凜凜，甚至於是「生死尚且不顧，豈復有成敗之可言哉？」這樣地壯烈。至於「國家社會黨初創立，我嘗登北大清華教授之門，則語之曰：『張先生請你不要時常上門，否則我的飯碗便有問題。』……惟有本其良心所認爲當然者以赴之，若稍存成敗利鈍之見，則惟有不組黨，……以自了漢終生而已」。（見「再生」雜誌張氏「答覆觀察週刊記者

對我評語」）。這自然只是張君勱自己的看法，若要問到當年北大清華的教授，卻也有人後來背地私語：「張君勱友於情篤：他府上有一位兄弟時而國家銀行的總經理，時而當朝部長；他們朝野一家，組黨得起，我們拿什麼奉陪？」這又是一種看法。更至於張氏因此就斷定北大清華的教授都是「以自了漢終生而已」的人，那可也不盡然。試看冠蓋滿京華，該數得出不少的這兩校的教授了罷？他們不過看不上眼張氏這種迂迴作法，輕輕悄悄就溜進了權門，不像張氏今天這樣殊途同歸，反鬧得個舉國風雨，而且他生不逢辰，偏只有在今天這樣內戰的瀰天殺氣之下，纔從血海裏撈了幾顆朱紅頂戴，蓋住一批門生故舊，鄉黨戚里的顱頭，如是而已。

曾幾何時，這「民主」黨魁的經綸抱負，只肯獻之朝陛，而畏避新聞記者如蛇蠍，引得記者們側面辛勤搜討，反而都看透了黨魁的妙算，公然報導着：「民社黨變成張家升官發財的資本了。」他們却遺漏了說：「自古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張黨魁在治國之前，打理打理點家計，正是合於古訓的呵！

假使說，像我這一套鄙俚不堪的說法唐突了高潔靈魂的「哲學家」，那我們又何妨引用兩句中國標準聖人孔先生的遺教以作衡量的標尺呢？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張先生今天可謂「毋忝」矣！但是「民主」呢？「社會主義」呢？更空頭一點說：「義之所當爲」呢？「超於科學以上的人生觀」呢？

我挽悼張君勱氏的「靈魂」。

二 起講

如果我在前一段的「破題」上點着張君勱的「靈魂」，用的是鄙俚的看法，那正因爲惟有像這樣的看法纔始能够貫穿地理解。難得張君勱慷慨，辛苦忙碌了幾十年，道德文章糟蹋了不少的紙張筆墨，總叫囂號泣着中國道德破產是最大的危機，儼然只剩下他一個人獨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眞傳，恰如他答復「觀察週刊」的記者所說：「……儘管無一人響應，我亦毅然奮起而已。」偏偏在他入墓之前，做得像是「一念」之轉，便教國人看透了他的眞面：活活留着一具之標本，替鄙俚的看法供給了不破的鐵證。假使正當去年「國大」問題瀕臨舉國的危機，而報紙上喧載着張君勱爲國是苦惱爲難（其實這或許是記者的錯覺）的時候，中國的列祖列宗在天有靈，趁時把他收回天上去，那還不知道要迷惑多少人心，爲這一個也算「民主戰士」流涕痛哭；自然我也就沒有機會在今天再寫這一篇文字。既然事實沒有如此，反倒教我們淸楚看出張君勱之所以爲張君勱，正是歷史社會條件的邏輯的必然。

在這一點意義上，張君勱是算對今天的中國有了貢獻的。所以，爲了接受他的這一點貢獻，我們纔值得談他。而且，我還是要用鄙俚的看法，認爲應當接受他的這一點貢獻的，仍然是和張君勱同其社會階層而無其機會的人們。大家趕緊死心塌地多用點從實踐上啓發的認眞思攷的功夫，莫跟他走進土八股爲主，洋八股爲從的「精神文明」的墳墓，就誤了自己眞能替國家民族作點有益之事的前程。至於廣大的人民階層，因爲是張氏稱作「不識字階級」，貶爲「無教無養，勝於鹿豕者無幾，又何論乎愛國之大義」的（見張著「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頁二），他們倒是比較地富有抗毒的體魄，輕容易享受不到張氏的一套「思想文明」的危害的。

到說這裏，就要談到張君勱的一套「思想文明」。

我不諱言這工作是一份沉重萬分的苦役，我手頭搜集到亞東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再生社出版的「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馮今白發行的「立國之道」和再生社出版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專輯」，幾讀幾輟，令人窒息欲死。而我又向來對於此老的文章不敢拜嘉，依理這些本只合昏庸老憒，於齋戒沐浴之後焚香拜讀的。但張氏今天既然也擠進了「訓政」的交椅羣中，我們就不得不另眼相看；再加之像「立國之道」這樣的書，我手頭的一本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的第三版，而初版出書是二十七年九月的事，七個月的功夫也竟銷去了兩版，可見得

這位「學者」是也還的確擁有他的讀者羣的。所以我就不避難堪的苦役，也寫出我的看法來。

張氏以担任了「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之一造主角，初爲中國學術界所注意。這是民國十二年二月的事，張氏挑起論爭的材料是一篇講演，地點是在清華學校（那時候還沒有改作大學），而後來張氏發爲文章登在清華學報却用的是「新民叢報」體的文言。這地點和文字體裁的二件事，已經就見出張君勱的雄心，簡直就是打到當時風靡一時的「糊塗」（這是當時反胡適之派的青年們稱「胡氏之徒」的諧語）的門牆以內，胡適之怎肯甘心，於是就有地質學家丁在君在胡氏主編的「努力週報」上的迎頭一擊。這一場論爭的文字，當年，就由亞東圖書館集爲兩卷書，此刻看起來，過時之論極多，而且也不是我這篇文字所將檢討的事。但有一件側面的問題值得注意，足爲評判張君勱之助的：就是當年張氏的恩師梁任公以「暫時局外中立人」的資格提出當時論爭的「戰時國際公法」，却用的是明白曉暢的「白話」。張氏襲用梁氏的文體，而梁氏反轉能坦然接受「新青年」諸子所倡導的文體。這雖然是一件形式問題，本無關於學術，然而即此一端，也就可以看出張君勱的保守至於頑固，愧對恩師，不肯接受客觀的眞理，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證據之一了。即使就文體保守這一點說，他也只能停滯在他的恩師所從晚淸桐城派文體下解放出來的形態，而並沒有如嚴幾道那麼上窺周秦諸子的魄力。

梁任公氏的這篇文字裏說到「在君和君勱交誼不同尋常。……這是我常常親見而且極愛慕的。他們無論吵到怎麼田地，再也不會傷私人感情，我是敢下保證的。」姑無論梁氏的政治成就如何，就這幾句話裏畢竟可以看出此公畢竟還不失爲尙未衰竭的階級的一代宗師，他已經看出了門下士子不免分道揚鑣，怕的張君勱有點抵擋不了文江不過，這才溫語齊加的。何況丁胡結納已成，儼然後來居上，梁氏心知其然，不得不致意珍重。要允許我說得更爲露骨，這一場筆戰反映着自覺或不自覺的地主＝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之爭。（因爲這兩造人物當時都是反孫先生的國民黨的。）

這所以胡適之嘲笑張君勱「處處排斥科學，處處用一種不可捉摸的語言」（見「科學與人生觀」胡序，頁九）儼然眞理盡在他們「科學派」那一面，却被陳仲甫先生指出他們的文字「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學概論講義』，不容易看出他們和張君勱的爭點究竟是什麼。」（同書陳序，頁二）尤其耐人回味的，是陳先生指摘胡博士「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地向適之拱手道謝！」果然胡博士終於是一個二元論者，一生搖擺不定，永遠看不出，也不去看中國發展的準方向。

也所以那「科學派」隨卽發展成爲「全盤西化論」以後，慢慢也就不肯隨便開腔，（接受科學倒底承認客觀眞理的存在，「全盤西化」無非就是澈底地殖民地化）偏這位張博士鳥

烟瘾氣，總還不肯停止他的著書立說。

偌大文明古國的一時之彥不能也不敢爽朗解答這提出了的科學與玄學之爭的問題，不是最足發人深省的嗎？

然而當時的張君勱有一點是其心可嘉的，就是他並不生心向外，勸告即將出洋的候補留學生們要「西洋之有益者如何採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不過他只能冬烘說理，致「科學派」看出他土頭土腦儼然還是頂戴花翎的學部提調的派頭，不免忍俊不禁耳。

正惟其張君勱壯年在野講學時還並不生心外向，所以他體察得到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永遠把握住哲學的重要性，不像「科學派」的國外奥援頭頭是道，無視於中國的苦難，以至於本來是弄哲學的，反倒厭惡這本行，譏之為「洋八股」了。

推移到了去年，美國獨佔集團奴役中國的大計已定，南京的所謂「國大」會場裏面，科玄兩派的博士彼此能够在主席台上會心地握手；反倒是仍然忠於故國，而且是和張君勱同創政黨的元老竟不惜幾十年的私交，風骨嶙峋地對他割席。這演變非像上面的說明，簡直無法理解。張氏在野時結納的政黨陣容裏面，雖然還是鳳毛麟角，於理也當包涵一個半個能够遂時進步，極小心而極準確地把取中國固有思想的健康成份加以適當的揚棄的代表人，原來舊有文化雖然總崩潰到了窮途，卻還不當完全絕代竟無一個健者奮起呵！

這裏就有張東蓀先生恰好塡補上這樣的一格。此老替中國舊式的士品背負了全部的擔荷，從抗戰及其後的民族磨練中，充分接受了力所能任的時代付託，而且從實踐生活上逐時突躍，憑假而將積量變爲質變，唾棄舊時所創導的思想而不稍吝惜。試看他在抗戰仔四生活中嚼着苦果所著成的三部曲和本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大學的講演（文載「時與文」第五期）之間已經有了不小的距離。

例如他在這講演裏說「我們所學的如果與人類幸福無關，則其價値都是可疑的」；而他在「理性與民主」一書頁一五裏却說「我們不必把文明一詞，使其具有人類幸福的增進之必然的涵義，而僅視爲一個中立的意思。」那意思還是含含糊糊積留着書齋論學，自謂超然物外的氣息。又如在同書頁一七裏東蓀先生還說「馬克思主義是學理與策略的混合物」，而在這講演裏卻有了修正，否定了舊時的意見了。又如他講演裏說，宋儒講理學是由於「宋受外族壓迫」，至於「宋儒所謂『明心見道』……那叫做自己騙自己！」這些話也都是他從前所不肯說的。更如「中日之我宣戰」，簡直是「以一人之我與全部新舊體裁的士大夫宣戰」。東蓀先生是曾經對梁任公氏有過敬意，願認師承的，照這樣發展下去，他將成爲梁門學人中最光榮的碩果。

裝癡裝聾的張君勱博士對此曾經多年相交而絕對一旦的老友的「明心見道」，感覺又是

如何？老友可是已經進於承認「談明心見道者，叫作自己騙自己」呢。

張君勱知道把握住了哲學思想的重要性，這是對的，因爲中國社會百年來在起着異樣的變化，翻騰苦厄，老是擺不到妥當的狀態，這情形苦惱了幾代的人心，必然地要反映到思想界。然而張君勱不知道空口說白話並解決不了問題，尤其是說些玄虛飄渺，空中樓閣，像是觸着了實際，而其實卻是鑽進了牛犄角，更加增添了問題的糾紛，阻礙了中國的發展。

我說他「不知道」，這還是從思想脈絡上說去的。至於實踐生活，他可是心裏透亮。正惟其實踐生活上他囿於他的生活圈子，這圈子要他說些似是而非的東西，他自己也不辭這「神聖的付託」，才發表他的一套文章。他既飽讀過「子曰詩云」，又識得A．B．C．D．」，所以說來自謂頭頭是道，而實質竟都是掩身烟幕，到頭來事實招供出他和他那愈趨愈下的社會層原本是一邱之貉而已。

例如，他那「立國之道」，一名「國家社會主義」的，宜乎是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體系的，他可是在凡例四上就認了口供，說是「此書之作，自覺體大而思不精」！「思不精」者，並無體系完整的條理之謂也。至於「體大」，無非暴露「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耳！乃至同書凡例三上竟說是「全文存有東說西說的痕迹」，更是不成話說。「立國之道」固如是其輕率潦草乎？嗚呼張君勱的哲學！

他這部大著還正是抗戰初期全國人心振奮的時候出版的，所以他說「關於抗戰很易得到一致的態度；（注意他說的只是「態度」！）因土地被佔領，人民被蹂躪，全國人民是忘記不了的。」（頁三）他說得一點也不錯，只有「人民是忘記不了的」，他這位「立國」的黨魁可有點把握不住，不要看他表面說得那麽神氣，「掌舵的看準航綫，照舊前進」，北平南京的敵僞朝廷之上他可先後都派有黨羽代表人呢。關於這後一點妙在張君勱倒是有了他所服膺的「文化」根據的，他說：

「我祖宗只知道注重文化，故其對於天下觀念與國家觀念，其間並無劃分之界限。僅以文化爲標準，只須異族承受我之文化，即可把他當做自家人看……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皆由於『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思想中產生出來的。」（頁十四）

看他一口氣玷污了千古多少復國的志士仁人和忠於民族的思想家，原來他的祖宗只知道注重亡國的文化！就連孔丘先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說法，都被他誣蔑成爲「敵來則受，敵主則我奴」的怪解！不知道張君勱讀論語到「鄉愿，德之賊也」的時候，臉上發燒也否！

異族入侵，可以「當做自已人看待」，那麽，張君勱又怎樣看待自已人呢？

我們這個民族太聰明了。……附近的蠻夷也沾光不少。……至於大多數人，既無智識，自然更談不上愛護自己的文化了。」（頁十六）

可見儘管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太聰明了」的民族，可是愛護「文化」這一個大擔子，大多數是無緣的了。而這些「蠢如鹿豕」之輩，如前面所已經引過的，那就只好「人民應該服從此權力（指政府）之行使等等，我國近幾十年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方面。」（頁十九）「幾十年來，都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方面。」實在是可怕得很，那該怎麼辦呢？張君勱說了：

「凡是一個民族所以能自立的往往雄一二英雄豪傑之士，立下一番大志願，這志願起初不一定有很明顯的形迹漸漸推廣以至成爲民族運動。」（頁二〇）但是誰又是「英雄豪傑」之士呢？「不一定有很明顯的痕迹」又是什麼樣的「志願」呢？——尤其是單靠一二英雄豪傑之士行不行呢？張君勱也是一個掛着「民主」牌號的黨魁呀！那就是這樣辦：

「只須將無知識的國民使他成爲有知識……大家只要尊崇道德高、智識富的政治家，並且同他合作，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不是不能實現的。「（頁十九）

這裏張君勱又沒有說明程序：倒底是先「將無知識的國民，使他成爲有知識」，然後才

「尊重道德高，智識高的政治家」呢？還是就由「道德高、智識富的政治家」來「使他成爲有知識」？假使是前者，那麼，張氏在「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一書上卷五四頁裏又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歷代之帝王，但知以高官厚祿餌天下之士……其百分之九十之農民……至於未造，則聽其流爲賊盜土匪而已。……今民國雖成立，而此種眼光迄猶未變，人民之不教不養如故焉。」這意思像是說歷代被帝王所餌的「天下之士」自來就沒「道德高、智識富的政治家」，那樣人民就永遠沒有得知識，「愛護文化」的機會了。假使是後者，那些「道德高、智識富的政治家」又怎樣教「蠢如鹿豕」的人民「同他合作」法呢？

他又說了：「各黨之間各存善意，而不互相搗亂」。（「立國之道」頁九七）這話是抗戰初期說的，這時候張氏的黨，如我在前面所說，還在那裏動搖擺閃，而却又捨不得「忘記不了」抗戰的「無知識」的人民，才說出這樣的話來。其實張氏以在野黨魁的身份，骨子裏反倒是責備在野政黨的。例如，他說：

「因爲在野黨想搶民衆，於是政府黨亦以黨的名義伸手於工人農人和學生之間，……加以種種誘惑，以與在野黨相抗。……所以就現在組織羣衆的方法……徒然走上自私的分裂的途徑罷了。」（同上書，頁三七〇）

這裏明明說政府種種誘惑人民，以與在野黨相抗，可見得在野黨無須「加以種種誘惑」

自然也會得到人民的信任。爲什麼這樣又算是「自私」呢？是不是張氏的貴黨無須乎人民的推戴，而黨魁就本來是天生的「道德高、智識富的政治家」呢？

然則「民主」在野黨究竟如之何而後可呢？——我從另一部大著上，捉摸着了一個大概，其情形似乎是應當這樣的：

「有通十三經二十四史之大儒，同時不能少但識千字課之國民；有主敬習靜之周張程朱，同時不能少出入運動場之羣衆；有唐宋明之畫，同時不能不使田野小民聆略美術之風味。否則雖有少數碩學探幽索微，其奈蚩蚩者氓不能隨之奮起乎？」（「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頁五一）

像這種樣子的領導法，大概其庶幾乎免於「自私分裂之途」，可以躋國家於郅治之隆了罷？

但是張君勱又是精神西方典籍的，所以他又怕這樣的境界不容易實現；於是也談些歐美的民主。他說：「英國之大憲章及瑞士等小民主邦，可謂爲現代民主政治之先驅。眞正的民主政治在法國大革命後與美國獨立以後乃始產生。」（「立國之道」頁一〇三）然而相隔不過四頁，他却又說是「民主政治以和平解決爲基礎。」（同書頁一〇七）究竟眞正的民主怎樣才能降臨中國呢？是像「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那樣作法抑或以「和平解決爲基礎」？

現代的中國實在難辦，我們還是隨着張君勱神遊往古罷。

「在中國歷史上，大家目秦始皇之焚書坑儒爲中國文明最倒霉的時期，……然自民族之武力或抵抗力觀之，秦始皇和漢武帝，實爲民族英雄。……不能不說是秦始皇的功施於四千年之後，至漢武帝的功更大……」（「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頁七九）前面說了「只須異族承受我之文化」那就讓他來作中國的主人也都滿不在乎；這裏又說「民族英雄」焚書坑儒造成了「中國文明最倒霉的時期」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原來「文化」與「武功」是這樣不相容的東西！那麼我們到底是要文化還是要武功呢？

然而可哀的是古境不再來！「自從東北四省淪亡之後……何以祇有極少數人熱心抗日，而大多數人還是漠然無動」呢？張君勱說：「……這種種問題與其說是外交上，軍事上的失敗，毋寧說是民族性的缺陷。」（同上，頁九）這怎麼辦呢？於是，張氏專著了「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一文，這却又要參考「歐美各國民族性之養成」。「句是歐洲民族性之養成，非一日之事，多則千年以上，至少也應溯到十六世紀」（同上書，頁十一）

天呀！養成民族性是這麼費時間的事，而我們的民族性又因爲有了缺陷才招來外禍，那麼，這「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倒底還須要多少世紀才能恢復秦漢的威武呢？這眞是急壞人了！

亂急也是沒有用的。目下張黨魁也擔當了「訓政」的大任，他說過「所以決不是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的人，便算是中國人。」（同上書，頁一〇）所怕的是人們的國籍都教張黨魁否定了，成爲無國之民了呵！

我的手也寫酸了，實在再不能抄下去呵！

三　尾聲

一、我這上面兩股文字，其實主要的意思已經在「破題」一股裏說完了：張君勱的思想與政治作風代表了的那個階層，已經到了衰竭的境界，梁任公氏地下有知，該是怎樣的感慨，這焉得不讓張東蓀先生大聲疾呼「中國現在已經走到窮途」呢？

二、然而張君勱却代表了最「標準的」在野「民主」政黨，將要開創未來中華民國的歷史新頁。所以上海社會滿市傳說，民社黨生意興隆，請求入黨的「群衆」盈門塡戶。要模仿一句「阿房宮賦」的老調，這眞叫作「張君勱不暇自哀而外人哀之。外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外人而復哀外人也已，噫！」

三、張君勱對今天中國的貢獻，是他供給了社會層政治代表人的一份完整的模型：而他對中國的罪惡是損傷了或許可能獲致的和平轉機，敗壞了中國新機運之下的政黨道德。

四、我在「起講」一股裏所論，是我從張氏各種著作中抽取而成，我只能抽取得出這樣一條可理解的線索。至於其他方面的問題，因爲「烟波浩邈」，張氏又自稱是「東說西說」的，這裏就不要研討下去。我的「八股」因此也就無力終篇，權且寫完兩股，急就章地就接上「尾聲」完卷了。

五、平情而論，張先生外表上彬彬長厚，不失爲可敬的學人，此文之作，應該是無傷於我對張先生私人的不惡的印象的，我以爲。

六、說清了第五點的意思，最後爲了扼要說明，我還想爲張先生作一副像贊，以挽悼他的「靈魂」，儘管我也祝願他的軀體長生不老。贊曰：

黨魁其貌，冬烘其神；
文化在口，利祿在心，
吁嗟乎！
秦皇漢武不可復見，
空教希特勒之黨號
長留中國之士老模型！

三六、四、廿九日